

## 夏目漱石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 一、夏目漱石的译介情况

#### (一) “五四”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的译介

夏目漱石在中国的译介始于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一场演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30年的小说概况进行了梳理，尤其对夏目漱石表露文学的“低徊趣味”和“有余裕的文学”进行了个人意义上的深入理解与阐释。他认为：“自然派的小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玩赏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的由来。”<sup>①</sup>

周作人对夏目漱石“有余裕的文学”的推崇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与周作人本人对“人的文学”的追求和“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思想启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周作人对晚明小品文的迷恋，延续了中国古人对独抒灵性的一种人生的品位和格调，这是他对夏目漱石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潜在文化因素。而“五四”时期对个人思想解放的呐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其实蕴含对人的重现发现以及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抒发。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夏目漱石在40年代，只在中国少数几个文人间进行译介交流，因为一般人只是将夏目漱石的“余裕”与“悠闲”定位

---

<sup>①</sup>《新青年》，第五卷第1号。

为一种有闲文化，在整体氛围上，夏目漱石与自梁启超以来提倡“小说与群治”的宏大家国话语是抵牾的。“五四”以后，革命政治文学的风潮以“革命救亡”的高调掩盖了这种对人的全面发现和自由追求。周作人在政治追求中的失调，更加剧了人们对夏目漱石这种“有余裕的文学”的疏淡与冷遇。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对夏目漱石的论析，规约和牵制了三四十年代的人对夏目漱石的进一步解读。即便是现代文学的启蒙大家和后来作为革命青年人和革命战斗文学的引路人、推动者鲁迅来讲，也是将夏目漱石定位为一种“余裕文学”，并在与周作人编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商务印书馆）提出：“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sup>①</sup>鲁迅翻译了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小说《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对夏目漱石的看法与周作人基本一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思想启蒙者，鲁迅对夏目漱石的喜爱当然有他个人美学上的追求。事实上，他对汉魏六朝的崇尚自由和强烈个性表达的散文就十分偏爱，如他曾经写下了流传广泛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清峻”“通脱”的魏晋风度大为赞赏。这种风格追求与夏目文风是有着密切关联的。实际上，夏目除了在文风上吸引周氏兄弟外，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判思想对鲁迅影响尤为明显，他的《阿Q正传》和《藤野先生》等文章，都受到了夏目这种思想的启发。

1929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了《草枕》（即《旅宿》）的译本，由崔万秋翻译（1941年，上海益智书店又出版了李君猛的译本。1956年，丰子恺翻译了《旅宿》，收入《夏目漱石选集》。）文中描述了一个躲避俗世烦扰的画家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寻找一个“非人情”的唯美世界的见闻感悟。文中，对空灵世界的唯美描写，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庄禅世界的追求和向往，深得国人的喜爱。译本一经传世，便赢得了世人的广泛注目与好评。当时市面上多次流传翻译的盗版本，后来亦有学者多次翻译，比较突出的是丰子恺于50年代的译本。

193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张我军翻译夏目的《文学论》，周作人为之作序。这是我国较为系统地翻译国外文学理论的著作，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写作及文学创作

---

<sup>①</sup>《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7。

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夏目于1907年发表的成体系的文学概论性质的专论，在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远远超出同时期的欧美。他提出，文学是从心灵出发的，文学是“F+f”的结合，即认识性的要素（F）和情绪性的要素（f）的结合。王向远认为：“作者不是以某种‘主义’而是以‘全义’的视阈，以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作家的三重角色，从（F+f）的“文学公式”出发，以‘焦点意识’‘幻惑’‘文学语法’‘暗示’‘渐进推移’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为中心，以18~19世纪英国文学原著为主要例证，阐述了文学构成论、文学特性论、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论、文学修辞论、文学推移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堪称世界上第一部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写成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概论著作，对今天的中国文论界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sup>①</sup>由于翻译时间较早，译者对夏目《文学论》中的一些概念的理解存在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这也促发了王向远重译这一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理论专著。

1932年，中国开明书店出版了章克标的《夏目漱石集》，内收中篇小说《哥儿》、短篇作品《伦敦塔》和《鸡头序》。译本前有章克标写的题为《关于夏目漱石》的译本序言。章克标认为：“漱石的文艺的精神，第一是在俳句，他大概很受了正冈子规的感化。子规和他同时在第一高等学校及帝国大学念书，他们是很好的学友。其次是写生文，也是子规所提倡的照真实叙写自然的文章。因此达到托怀感于天然自然的风物、忘却尘世俗事的一种东洋的趣味。再由此达到对于禅味的兴感，造成了漱石的文艺观的不动的根基。”<sup>②</sup>章克标在译介过程中，对夏目的文风深有研习。他指出，夏目将小说分为两类，即“有余裕的小说”和“非余裕的小说”。“所谓有余裕的小说，是优游不迫的小说，避开非常这字眼的小说；没有余裕的小说是紧张逼迫的小说，像要窒息的小说，不含有幽闲悠逸的分子，而以关于一生沉浮的大问题为主的小说。”<sup>③</sup>而由“有余裕的小说”，发展出一种“低徊趣味”，“此种风趣，贯流于漱石的全部作品之中，稍一留神就可以发现的。更从这低徊趣

① 王向远：《卓尔不群，历久弥新——重读、重释、重译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1）：78。

②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集》，章克标译，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2。

③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集》，章克标译，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3。

味联想过去，还有一种非人情的世界，是主张艺术的一境地中，有一种超越了人情的世界。《草枕》可以算是去描写这境地的。”<sup>①</sup>从中可以看出，章克标对夏目的文风了然于胸，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多有借鉴。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夏目漱石选集》，包括《我是猫》及《哥儿》《旅宿》（即《草枕》）。其中，《我是猫》由胡雪和由其（即尤炳沂）翻译，《哥儿》由日本文学教学与研究大家刘振瀛先生翻译，《旅宿》由我国著名文学家、画家丰子恺先生翻译。此外，选集中收入多篇论夏目作品的译本序以及关于夏目漱石的思想、艺术特色的剖析文章，刘振瀛先生为选集作了总序。刘振瀛先生介绍了夏目漱石的生平与创作，重点评论了《我是猫》及《哥儿》《草枕》三部作品。他指出了夏目对社会批评的批判现实主义文风以及文本所体现的一种人民性的特点，由此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丰子恺先生在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以及对日本文学精髓的感悟，使他的《旅宿》充满了一种日语与汉文的交融之美：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日本词汇的原有语感，又体现了汉语的包容性和古雅。夏目在文本中所体现的空灵虚幻的唯美世界，他独特的意象世界和结构特色，借鉴了中国道家 and 佛禅的哲理思维，妙用中国古典诗词，这些因素都契合了中国文人对文学理想和纯美世界的崇高追求。因此，他的译本文采斐然，古雅而不失明晰。我们选取一段丰译本来看：

……诗思岁不落纸，而铿锵之音起于胸中。丹青虽不向画家涂抹，而五彩绚烂自映心目。只要能够如此观看自身所处的世间，而把浇季浑浊的俗界明朗地收入在灵台方寸的镜头里，也就够了。是故无声之诗人虽无一句，无色之画家虽无尺绢，但在能观看人生的一点上，在如此解脱烦恼的一点上，在能如此出入清净界的一点上，以及在能够建立这晴朗的天地的一点上，在扫荡我利私语的羁绊的一点上，——比千金之子，比万乘之君，比一切俗界的宠儿，都更加幸福。（选自丰子恺《旅宿》，见《夏目漱石选集》）

整体上，这几位译者由于自身文化修养较高，对中日文学的造诣颇为精深，个

<sup>①</sup>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集》，章克标译，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4。

别学者曾长期从事中日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因此，对于夏目漱石的文风和遣词造句颇为了解，译出的文本质量较高，受到了世人的广泛好评，是后辈学人研究夏目漱石的重要参考译本。

## (二) 80~90年代的译介

这一时期对夏目漱石的译介呈现系统性，规模幅度较以前有较大的提升，这是随着我国对夏目漱石翻译与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最为突出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书籍。80年代初，陈德文翻译出版了《三四郎》《从此以后》的单行本，以及《夏目漱石小说选》（上下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卷于1984年出版，是陈德文在发行单行本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1985年，该社又出版了下卷，包括由张正立、赵德远、李致中翻译了夏目的《春分以后》《使者》（原名《行人》）、《心》三部小说。这套总共100余万字的小说译本，是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夏目漱石选集》之后规模最大的中文译本，是我国夏目漱石研究中必要而厚重的参考资料。

日本文学翻译家吴树文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3、1984、1985年连续出版了《三四郎》《其后》《门》。1988年，他将以上这三部作品合为《爱情三部曲》在该出版社发行。吴的译本文风老道，文辞优美，可读性强。1987年，该出版社出版了刘振瀛等译的《哥儿》，还包括《伦敦塔》《玻璃窗内》《文鸟》《十夜梦》等散文作品，这些均由陈德文译。夏目的后期两部长篇小说《道草》和《明暗》（未完成）则分别由柯毅文和于雷于1985年和1987年翻译出版。

除了上述这些译作外，还有关于夏目的重译作品。如1989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德文翻译的《哥儿·草枕》。我们比较章克标、刘振瀛、陈德文三人对《哥儿》翻译的版本，可以看出他们对翻译文风有不同的追求。章译追求的是像鲁迅一样的忠实于原文，但又超于鲁迅的硬译风格。而刘译除了追求文本的“信”和“达”以外，还追求一种神似和生动传神的效果。陈译文学性也极强，生动可读。总的来说，这些译者的日语水平和文化修养都很高，译本质量可靠，既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韵味（章译稍逊），而且突破了简单的翻译语词转换，更加注重一种个人式的翻译效果，讲究文学性和文本的审美特色。另一个被重译的突出经典文本是

《我是猫》。1993年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于雷的译本，199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刘振瀛的另一个译本。于雷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文学。二者浑然一体，如同花卉与色彩，并无轻重之别，主次之分，忽视这两个特征的任何一方，都谈不上文学翻译。”<sup>①</sup>由此，他指出翻译就要“力求与原文词语等呈信息的转换；力求准确地译出原文句式与语法特色；力求最充分、最贴切地转达原文的内容、神韵以及文字美、风格美<sup>②</sup>。”这种对文学翻译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刘振瀛先生是相似的。刘振瀛先生认为，翻译不应只追求表面上的“信”“达”，翻译者“应当是他所从事翻译的那个作家的研究者，或者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个好的理解者”，他翻译的《我是猫》就很好地贯彻了他的翻译主张，译文生动准确而传神。二人对这种由翻译而文学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追求锲而不舍、兢兢业业的态度，奠定了他们译本的高质量，成为后辈学人翻译和研究的优秀范本。

### （三）新时期的译介

200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林少华译的《心》。小说以徐缓沉静而又撼人心魄的笔致，描写了爱情与友情的碰撞、利己之心与道义之心的冲突，凸现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矛盾、怅惘、无助、无奈的精神世界。这是夏目后期作品中较为注重从心理刻画方面描写人物的重要作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李正伦、李华译的《十夜之梦》，这是夏目漱石的随笔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了夏目的《玻璃门内》，含夏目漱石小品四种。

中国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竺家荣于2013年翻译了夏目的《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了夏目的《我是猫》（中国华侨出版社）。由于翻译较晚，译者能够充分吸收先前译本的特点和长处，加之译者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修养，译本成为能够吸收众家之长的优秀译本。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文学翻译家文洁若翻译了夏目的《杂忆录》（2013年红旗

① 金中：《艰苦探索的结晶——评介于雷著〈日本文学翻译例话〉》，《日本研究》，1994（2）：75。

② 金中：《艰苦探索的结晶——评介于雷著〈日本文学翻译例话〉》，《日本研究》，1994（2）：75。

出版社)，收入了夏目漱石的小说《趣味的遗传》（1906）、散文《杂忆录》（1911）、怀念文章《基布勒先生》（1912）、《战争造成的差错》（1914）。夏目的文学理想是一种尊重道义的个人主义，由此出发对日本进行社会批判。这本《杂忆录》，深刻反映了作者的内心复杂思想状态。而一直没有得到翻译的《虞美人草》在新时期也得到大家的关注，并由陆求实于2014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为线索，描写了一系列的纠葛和冲突，小说反映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纠葛，更是价值观、人生观的冲突。它是夏目漱石成为职业作家后的首部作品，也是他从创作初期进入中期的承上启下和转型之作，作品深刻揭示了“我执”这个人性主题。2015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文学大师夏目漱石作品精选集》。应该说，这是夏目漱石译著的一个普及本。对于喜爱夏目漱石的读者来讲，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总的说来，夏目漱石在我国的译介走过了一条从简单到深刻、从单部作品的译介到有系统成规模译介的历程。从最初的周氏兄弟对夏目漱石的译介，就翻译的“信”而言，鲁迅显然要做得更为忠实。但就翻译的文学性而言，显然，周作人要高出一筹。而稍后的章克标在文风上酷似周作人，但在翻译理念上确实是传递鲁迅等人的“硬译”思想。而50年代刘振瀛先生和丰子恺先生既做到了较好地传达原文的韵味，又做到了优美传神，可说兼顾“信”“达”“雅”之美，翻译的文本呈现一种各因素浑融的审美之境。80年代以来，于雷、陈德文、吴树文等人的译本尤其突出，他们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较高的艺术修养，对翻译至高境界的臻臻追求，奠定了他们译本的可靠性和可读性。新时期的文洁若、竺家荣等人，或对经典的重译如《我是猫》《心》《哥儿》等，或翻译夏目漱石未译之作如《虞美人草》《杂忆录》等，表明我国翻译界对夏目漱石的作品翻译和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在兼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翻译家的功底和水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展现，夏目漱石译本的文学性和语言的准确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各种小说、散文的选读、选集等开始纷纷面世，这将意味着新时期对夏目漱石作品的译介在中国全面开启并得到重视。对于夏目漱石在日本与鲁迅在中国相似的崇高地位比较而言，鲁迅在日本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各种选集和全集都有面世；相反，夏目漱石至今在中国没有见到全集出版。这既与我国特定条件下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有

关，也与夏目漱石本人的文学理想和追求以及国人对之进行阐释而产生的误解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但无论怎样，各种现象都表明，新时期对夏目漱石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契机。

## 二、夏目漱石的研究

除了周氏兄弟对夏目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的推崇，从而无形之中给后人以潜在的影响之外，中国革命风潮的汹涌，导致人们对夏目漱石产生片面理解。加之夏目本身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和后期在纯审美的艺术之境中做心灵的遨游，提倡“则天去私”的无为思想，中国大多数学人对夏目的理解仅仅止步于资产阶级化的“悠游”和“余裕”，认为其书是一种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因此，一般学人对夏目都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当然，鲁迅除了在文学创作上持有“余裕”心态而对夏目持赞赏态度之外，也对之进行了符合自己审美习惯的改造，这一点我们下一节会详细论述。

作为有留学日本经历并翻译了夏目作品的章克标来说，其受到夏目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文本中，二者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文学理想和创作手法方面有诸多的相同点，但其本质的差异也是明显的。1930年，章克标翻译并出版了《漱石集》，其中包括中篇小说《哥儿》、散文《伦敦塔》以及一篇夏目论高滨虚子的“鸡头序”。章克标对夏目流露在小说中暴露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对不公平社会的批判以及幽默诙谐的创作手法都了然于胸。章克标一系列的作品，都体现了夏目的这种潜在影响。他认为夏目的性格“第一就是反抗的精神，反抗时代的潮流及锄强扶弱的一种所谓侠气；第二是依了正义的所指，调制自己的行动；第三是轻快洒脱的趣味”<sup>①</sup>。章克标指出，《哥儿》“自然是着意地痛骂当世的社会及教育界了，但是只使人觉得痛快的。这比他别的小说，还有一个异点，是在滑稽谐谑的嘲骂世俗以外，还是替天行道，对于不正不德的人，加以制裁，有高树理想的旗帜之概”<sup>②</sup>。

<sup>①</sup>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集》，章克标译，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2。

<sup>②</sup>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集》，章克标译，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12。